

邵维正

他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和出席会议的人数，解决了中共党史上两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他独立完成了中共第一部创建史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他就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党史专家邵维正。



延安宝塔山下，邵维正为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录制《党史故事100讲》。图为录制现场。高虹摄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录制的《党史故事100讲》，7月1日在央视10频道《百家讲坛》栏目播出，党史专家、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政策理论教研室资深教授邵维正应邀主讲。年届80的邵维正是《百家讲坛》开办以来最长的主讲人。作为央视的品牌栏目，《百家讲坛》对主讲人的选拔面向全国顶尖专家，作为一个并未上过大学的军人，邵维正如此高龄受邀，足见其在该领域的造诣。

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时间

邵维正出生于江苏常州，祖籍浙江黄岩。1951年3月，邵维正弃学从军，去了朝鲜战场参战。回国后，邵维正去了西北戈壁某师，期间还参加过高原平叛战斗。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被选派到解放军长沙政治学院学习了一年半党史。

1978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邵维正调入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担任政治理论教员，开始了长达30多年的教学生涯。

邵维正来到学校进行党史教学之初，参与了大型历史著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的编撰工作，他负责“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部分的撰写。因为中共一大是在严峻的社会背景下悄悄召开的，参与者随着革命大浪淘沙，幸存的人多年后也记不清具体的召开日期了，所以7月1日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中共一大召开的日期。于是他打算整理涉及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资料，不畏艰难，重新调查考证中共一大召开时间和参加人数。

方向确定以后，邵维正开始了忙碌的考证工作，那段时期是他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那时没有网络、电脑，邵维正为了查资料，骑着自行车跑遍了中央档案馆、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资料室等一切存放有文献材料的地方。经常是白天查资料访问，晚上整理材料到深夜。常常两三个星期才回一次家。他记录资料的卡片渐渐地堆起了1米多高，同时也制作了“大会日期研究提要表”。为了更好地保存资料，中央档案馆要求查询人员不能喝水，翻阅资料要戴上手套。时值酷暑，在屋子里，邵维正小心翼翼、逐字逐句地查遍了所有当事人的相关资料。终于，经过详实的考察和严谨缜密的论证研究，他推断并确认了中共一大的召开日期和参加人数。

1980年1月，邵维正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论文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公开发表，在国内外掀起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共党史权威胡乔木同志对这篇文章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位同志下了这么大气力，弄清了十几年悬而



邵维正。李步前摄

未决的问题，这是党史研究的一大成果啊。”邵维正由此奠定了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地位。

撰写首部中共创建史专著

一举成名的邵维正并没有自满。在拜访几位党史研究界的前辈时，前辈们语重心长地说：“党史研究是一条特殊的战线。过去，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不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许多人怕搞研究了，年轻的又接不上。再过几十年，共产党这本‘家谱’还是要有人来续，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也是历史的需要啊！”

邵维正坚定了党史研究道路上的方向。他认为中共党史不但国内在研究，国外也在研究。如果国内不能进行有效地研究考证，国外的研究常常会扭直作曲，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中共党史研究在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邵维正清醒地意识到，进行党史研究必不可少的是深厚的基础知识。为了充实党的各时期的基础知识，他决定从党的创建时期开始，逐步进行体系化的学习钻研。在建党70周年之际，邵维正独立完成了中共创建史研究的第一本专著《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以30万余字篇幅，对中共创立的社会基础和背景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系统的阐述，填补了中共党史研究的空白。这部论著获得全军一等奖，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定为党史研究必读书目。

从中共创立的起点逐步扩大，邵维正紧接着参与主编了《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担任主编或副主编的有6本全军统编教材，即《中国革命史》（1986年版）《简明中国革命史》《中国革命史》（1992年版）《中国革命史专题教程》《中共党史专题教程》《中国革命概论》。很多读着邵维正主编的党史教材成长起来的学生如今已经成为了教研骨干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在学术会议上，邵维正常常遇到当年的学生，他们时常这样介绍自己：“我是读着您的教材成长起来的。”

20世纪90年代初期，总后勤部轮训大队成立之后，邵维正教授主要负责总后高中级领导干部理论的轮训教学工作，这样更加拓宽了他的研究领域，其中包含党的创新理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军队政治工作等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2001年在建党80周年之际，邵维正历时3年组织编写出版大型党史读物《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一经出版多次出现了脱销的局面，出版社连续重印7次，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评价该书“开辟了党史写作新路子”。该书生动形象，图文并茂，呈现了党的发展历史，成为普及党史的典范读物，获得全军图书奖、全军政治理论研究成果特别奖。为纪念中国共产党90华诞，邵维正主编出版了《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批向党的90华诞献礼的著作之一，被评为中组部、中宣部向全国党员干部推荐的第三批理论学习书目。

邵维正对教学情有独钟，30多年来坚守在教学一线。从军60载，从教30多年，邵维正在部队和地方作辅导报告1700多场次，获军队院校育才奖“金奖”和军队专业技术重大贡献奖等40多个奖项。他尽心播撒着党的创新理论的种子，为中共党史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如今很多社会问题、民族文化素质问题都与我们长时间冷落传统文化相关。我们要和传统对话、和经典对话，要让文艺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留住乡音乡情。
——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濮存昕表示

●在市场经济时代，一部分文化产品加入到产业化、商业化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消费主义可能给文艺造成损害的这种警惕性不够。需要警醒的不应该只是文化生产者、产品提供者，读者作为文化产品的消费者，也有自己的一份责任。
——作家阿来认为

●与创作的繁荣态势对照，理论批评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显得有些薄弱，有许多问题亟待理论批评的梳理和关注。没有理论批评及时把脉与矫正，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将无从谈起。提高理论批评水平，是儿童文学发展的当务之急。理论批评应当特别重视本土的原创作品，对那些符合儿童心理特征、蕴涵丰富、艺术上有特色的作品，应加大评论和推介的力度。
——儿童作家金波认为

●最好的电影导演是有话要说，不管走到哪里，始终要感知自己与世界与现实的关系，当有冲动有话要说时，完成的作品才是言之有物，有感情、有温度的。贴近社会、贴近现实，才能拍出有质感、有温度、有肌理的作品。
——导演王小帅表示

●我现在的感觉是今天的文学也许难呼应今天的现实，但是，今天的现实一定会成为明天的文学。
——作家苏童认为

●音乐就七个音符，但它能够不断地反映人的喜怒哀乐，反映各种情绪。我们首先要尊重，再去学习、分析，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思想，再去前行，这才是一个创作者的追求。
——作曲家徐沛东认为

●只有文学本身可爱，奖才可爱。奖能锦上添花，奖能促进发行，但是奖不能弥补缺陷，奖不能化东施为西施。把功夫放在争取得奖而不是写好作品上，只能说作者没出息到了极致。
——作家王蒙表示

(刘格非辑)



任士荣

让盲人享受音乐

王玉藻



每一堂课，任士荣（左一）都毫不保留地把手风琴演奏技巧传授给学员。

当人们从北京市海淀区采石路7号社区活动室经过时，都会被从屋内传出的优美手风琴乐声吸引而驻足。合奏、重奏、独奏，琴声、掌声、笑声……因活动室地处空政文工团院内，人们自然地想象这是专业团体的练功琴房。其实，这是任士荣盲人手风琴班在上课。

任士荣曾是空政文工团的手风琴演奏家，是我国最著名的手风琴大师之一。

2007年，有一次，任老为一场手风琴比赛当评委。中间休息时，有两位盲人找到他要学手风琴，看到他们真诚渴望学习手风琴的样子，任士荣很感动。于是他收下了这两位盲人学员，不久，又组建了盲人手风琴班和中老年手风琴班。任士荣义务授课，这一教就是八年。“因为盲人看不见，我就为他们总结了触摸教学法，让他们摸黑键、摸手型、摸风箱，让盲人学员通过触摸来感受和体验拉琴的技术和演奏的技巧。”任士荣说。

80岁高龄的任士荣谈起学员学琴，异常兴奋，说自己却总是那么简单：“能被社会需要，被别人需要，就是一种幸福，我要让盲人也能享受音乐的快乐。”

下课了，任士荣第一个走出教室，他拉着一队背着手风琴的盲人走出大院（下图），几年来，这一幕曾让多少人感动。

(据《劳动午报》报道)



坚守党史研究的将军教员

张炜煜 孙宁川



武强年画制作工艺采用的是雕版印刷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现在，马习钦正潜心研究武强年画的制作工艺，结合现代手法，使武强年画的绘、刻、印、裱四个流程在不失传统做法的同时，更加先进。

马习钦与武强年画

宋玉珊

马习钦是武强年画的原产地——河北省武强县街关镇人。自宋元开始，武强人就用地里草做纸，用土生杜梨树木料做版，用槐花（黄色）、石榴花（红色）、靛蓝草（蓝色）、锅底灰（黑色）榨取天然颜色来印刷年画。武强年画明初已初具规模，清康熙、嘉庆年间达到鼎盛，最高产量达1亿对开张，行销大半个中国。

马习钦所在的街关镇是武强年画制作、销售的主要集散地。在兴盛期，这里家家点染、户户丹青，都是前店后坊的格局。从16岁起，马习钦开始在武强画厂拜师学艺，师从孙惠荣。其间在年画老艺人韩贞祥先生指导下，学习木版年画印刷及印刷工具制作。为求工艺精湛，技艺超人，每天他都趁师傅休息时，偷偷练习刻



版，下班回家后，找一些废旧木板练手。练得手指磨出了茧，变了形，右手手指比左手手指粗一半，两手一比差很多。凭着这股子韧劲，不到三年时间，马习钦就熟练掌握了年画木版的全套雕刻技艺和木版年画印刷的各种技法。

有人曾对马习钦说：“手工刻版这么辛苦，买个机器刻吧。”但是马习钦说，老祖宗留下的东西不能丢，而且，机器是学不来这种传统技法的。他说，机器刻版分两种，一种是电脑钻头刻，一种是电脑激光刻。前者刻出来的交叉点是圆的，无棱无角，没活力，印出的画面死板；后者刻出的版，线条直上直下，不流畅，印刷时稍不注意就会把纸卡破。都不如咱手工的，陡刀立线，线条上窄下宽，成梯形，这样线条不易磨损，也不易断裂，使用刻划，印出的画面活泼不死板，看上去温和、舒服。

马习钦还调整改进了印刷工序，以前印刷使用品色，画幅装裱后跑色严重。1998年，他用国画色、广告色等染料经过多次试验，最后认为广告色为最佳原料。但是广告色遮盖力强，于是他更改了印刷次序，先印套色版，再印线条版，这样

画幅更加清晰、美观，装裱更加容易、不跑色。这是他对武强年画印刷工艺的一次大改革，使木版年画的观赏效果得到了显著改善。为印刷和补刻《乾隆版大藏经》经版，马习钦组织举办了传统雕版印刷培训，并亲自雕刻《释迦牟尼说法图》，使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雕版印刷术得到了很好的传承和弘扬，受到相关



专家和学者的认可和赞赏。

马习钦至今已从事武强年画创作研究40余年。自1975年起，他一直跟随高级工艺美术师路治国、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王子学创作和复制木版年画。1976年至1997年，他配合路治国创作和复制武强古版年画30余种。1994年10月，他与路治国合作复制的《大藏经门神》荣获文化部举办的“中国民间艺术——民间年画类金奖”。到20世纪末，马习钦将武强木版年画的绘、刻、印、裱融于己身，成为武强木版年画艺术传承的骨干和代表。他还举办刻版培训班，培养年画刻版、印刷人员100余名。2007年6月，马习钦被命名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武强木版年画代表性传承人。